

中国小说

修辞模式的嬗变

——从宋元话本到五四小说



上海三联书店



郭洪雷

著

旗山新文丛

中国小说研究

中国小说研究

中国小说研究

中国小说研究

中国小说研究

中国小说研究

中国小说研究

中国小说研究

中国小说研究

中国小说研究

郭洪雷 著

中国小说

修辞模式的嬗变

——从宋元话本到五四小说

【旗山新文丛】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的嬗变:从宋元话本到五四小说/
郭洪雷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3
ISBN 978-7-5426-2745-2

I. 中… II. 郭… III. 小说—修辞—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8763 号

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的嬗变

——从宋元话本到五四小说

著 者 / 郭洪雷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装帧设计 / 陈志皓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60 千字

印 张 / 10

ISBN 978-7-5426-2745-2/I·365

定价:25.00 元

序

孔范今

我想,评价一部学术著作的优劣,有个道理应该说是学界的共识,那就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应该具有一种一而二、二而一的双重品格,即:它既提供了一种具有自主创新价值的学术建构,同时又在治学态度、治学方式与方法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或者说足可成为一种范例。

对此,作为一种衡量尺度和理想性期待,有志的学人一向还是心中有数的。就以近百年来以变易的深刻、迅捷和以异质性介入进行重构为其特征的学术发展而论,具备这种品格的论著即多不胜数。然而这期间足以引为憾者,尤其是在治学理念和学术姿态方面所表现出的偏枯及其在学术发展中引起的不良影响,也是相当严重的,对其则更应给予清醒的认识。不然的话,其对当今学术发展的贻害将难以得到根治。事实上,这种由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而形成的“学术”对于学术根本需求的偏离,至今仍被一些人视为学术实现“现代性”转换的途径,和使新文学学科获得独特性价值与独立地位的基本遵循。在我看来,这种偏向主要集中表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在基本理论建构上表现出的对西方思潮和文论的一味追趋与依赖。回首近百年来新文论倡导与建构的实际发展,尽管也呈现为多元并峙与互动的状态,其中也不乏以审慎的学理立场会通中西的文论主张和颇富实绩的文论尤其是文学批评的成果,但从



占据历史主导性位置的文论主张和理论建构来看,这种倾向则是极为醒目的存在了。在主导性文论里,传统文论多被否定与搁置,基本上处于“失语”的状态,而为其张扬和使用的理论几乎全部从西方拿来,与我之研究者主体和本土研究对象之间皆非互动发现的生成性关系。究其实质,此等研究者主体,实为使用者主体,它们不是理论的生成体,充其量不过是“他者”理论的一个传播性载体,一个为其操控的工具化的人。我这样说,其意并不在于否定我国文论在实现现代转型中向西方文论借鉴的必要性和为其所实际呈现的重要作用。我只是在于说明,在必须与世界沟通对话中才能实现的历史、文化的现代转型中,为历史特定形势所需要的价值理解的合理的片面性,并不等于学理上片面理解的合理性。须知,人类文化固然有其共通的内涵和形式,但在不同的地理、种性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情境中形成的不同的文化系统,又都必然地有着与其特定生成基础密切相关的个性特征。如果以所谓“共通性”取代特殊性,尤其是误将只是作为西方文化系统演进发展的成果当作“共通性”的理论建构来否定本土传统存在和自主发展的合理性,其后果将是不言而喻的!更有甚者,西方文论的发展,不同阶段不同主张的理论建构之间,自有其起承转合的特定关系联接,而我们有些学人却不明就里,就随便片言只语地拿来拼凑使用。这样做的结果,且不说于正常的学术建构无益,就是于学风也是一种严重的败坏。

另一个方面的表现是在学科发展上的画地为牢。尤其是在现代文论和现代文学的学科对象界定中,受今古对峙、异质的成见影响过深,除了将古代文论、古代文学排除在这两个学科研究对象之外(一般说来,在维护学科对象的独特性方面,这样做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这一问题上也不能绝对化,比如,如果将对现代文学的认定仅仅局囿于“五四”之后的“新”文学,那就在现代文学时空的完整性上与实有悖了),还将研究的视野与探索也局限在被认定的对象范围内,仿佛它是一块“飞来石”,不在其范围内把握就不能保证其真纯似的。

殊不知,这种斩断文脉或者说隔断传统的认知方式,却恰恰不能正确地全面地把握这段文论或文学生成发展的内在纹路,为其所得出的结论势必悖谬于对象本身的历史性真实。

令人鼓舞的是,近十余年来学界对此种种历史遗传下来的非学理性倾向已日渐有所警觉和醒悟,着眼于自主创新、拓展视野、打通文脉的探索与努力,已渐渐由边缘性另类存在开始为学界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尤其是近几年来,这种新的学术努力不知不觉间已演成当下学术发展的基本趋势,昭示着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到来。在此期间,由这种探索所完成的学术论著时有出现,正是由它们,不断丰富、涵养和深化着这一新的学术态势,拓展着学术的新进境,有效地证明着这一学术转型的历史合理性与学理上的科学性。在这里,我要特意指出的是,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部郭洪雷博士的研究论著《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的嬗变——从宋元话本到五四小说》,就正是这样的一种成果,不仅它所提供的学术建构令人耳目一新,而且由其所彰显的也正是上述所言的学术意义!

从其整体性的成就来看,要而言之,我以为该论著最为显著者就是它成功地实现了“中”与“西”、“古”与“今”的两种贯通,并明确坚持了一个由对象特性出发的学术原则。

在“中”与“西”的贯通研究中,该书作者自觉地意识到并基本解决了两个前提性问题。一是“西”为何、“中”为何,必须真正清楚地知己知彼。他深知,在中国小说历史发展中虽然包蕴着丰富而深刻的修辞智慧和传统,但毕竟是零散而且缺少现代意义上的阐释与整合的,要完成这一研究,对西方小说修辞理论的借鉴就是不可或缺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对其基本的内容及其发展变化了然于心,对其有一种动态的准确把握。我很佩服他把这一理论或简或繁,解析得那么清晰明白,打通了这一理论历史发展和现实构成的内在筋脉与关节。在此基础上,他又重点对国内热捧的小说叙事研究与修辞研究的相通与相异之处,做了极有见解的分析,这对于厘清二者的关



系,并论证出小说修辞研究独立存在的合理性大有裨益。我认为他对小说叙事研究局限性的剖析尤为精辟且具有警示性,他指出:西方叙事理论由于极力追求所谓“科学性”,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往往将小说的内容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完全集中于形式。形式被看成符号,其意义取决于惯例、关系和系统,而不取决于任何价值和意义方面的规定性;作为研究对象,经典与平庸之作没有实质性差异,只关心作品的结构分析而不作评价,表面上的客观和所谓的“价值中立”只不过是创作中“虚无主义”在理论上的反映;“去主体化”,创作主体的中心位置被小说文本所取代,作者意图自然亦被削弱。此等切中肯綮之论,对于厘清西方不同文论之间的关系和全面理解和发展我们的小说研究,当会起到必要的启示作用。另一个是在中、西文论对话中的姿态问题。在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中,主导性的认知模式是在否定本土传统即民族虚无主义基础上对西方文论价值作绝对性的肯定,对话的目的即在于实现理想期待中的异质性置换。而这部论著虽然也极为重视对西方小说修辞理论的借鉴,甚至也认为完成和完美对中国小说修辞传统的现代阐释与建构,绝不能离开西方这一理论参照,但是,作者又同时清醒地指出: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修辞传统,这一传统在《周易》时代就已开启,“修辞立其诚”所体现的伦理精神,不仅成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了中国人修辞行为的基本规约。这是一种对自身传统价值的自信。正因有了这种自信,研究中才从容保持了与西方对话的自信、开放而又平等的姿态。他坦言:在这一传统的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西方修辞理论,发掘、清理中国小说自己的修辞传统,寻找在小说传统中湮没已久的修辞智慧,重描中国小说修辞模式嬗变的轨辙,为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研究标示出一块新的研究空间。试想,这样两种前提既备,贯通中、西的问题难道还会成为价值理念上的路障吗?

至于贯通古今,在该论著中则更是一种极为凸显的特点。作者的目的在于建构出一个对象历史嬗变的动态结构,而不是对一现代

小说修辞理论框架的构建,也不是仅对中国现代小说所做的修辞学研究。在他看来,一个民族在小说修辞实践中所体现出的整体修辞智慧,实际上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小说历史和小说文化之中,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小说文本构成的调整变化之中,就是如五四这种在古今之间发生深异变化的时期,其变易也依然是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发生的。所以,他在确立这一研究课题时,就坚定不移地锁定了以对象生成发展的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为考察研究的对象,在论著中也是在“通”与“变”中做足了文章。

而所谓坚持了由研究对象出发的学术原则,这在该论著作者的观点中也是有着自觉的认识的。他开宗明义即说:“对于理论研究,我们需要‘原教旨’精神,力求理论的纯正、彻底。而一旦将中国小说修辞模式作为研究的对象,我们必须从对象出发,从中国的修辞传统出发,对理论本身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补充。因为中国小说修辞模式毕竟孕育、发展于自身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并形成了自身特殊的文化品格,只有将其植入自身的文化语境,其发展变化的轨迹才能得到有效的澄清和把握。”据此,他对相关的修辞理论作了简化处理,并进行了重新整合,以求更好地把握对象。根据中国小说修辞的自身特点,他重点突出了三个方面的特征性内容:一是作为小说外部构成的文体形态的变迁。所以将文体形式作为小说修辞文本的外部构成,就主要是由中国小说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为在中国传统小说特别是唐传奇以后出现的各种小说形式,存在着大量其他文体向小说渗透的现象,它们在小说中行使着不同的修辞功能,从而形成了颇具民族特色的修辞形态。二是“讲述”与“展示”关系的调整。所以把它列为重点,是因在中国传统小说的文本内部构成中,“讲述”和“展示”是其文本构成的基本因素,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对象和语境共同决定着作者修辞策略的制定,其直接表现就是对“讲述”和“展示”的不同选择以及两者之间量的关系的变化和调整。三是小说修辞情境的变化。他认为要考察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的转变,其中一个



重要的内容就是考察“说话人虚拟修辞情境”从宋元话本形成,经由明清拟话本和明清章回小说的继承和发展,到清末民初在外来小说冲击下最终逐渐消解的过程。整部论著就是沿着这三个层面展开,使其得以实现了为其期待的确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研究和建构。

说实话,过去虽然并不乏对中国古代小说文类特征的关注与研究,对唐代传奇与变文、宋元话本、明清拟话本及章回小说,也都有不只一代人对它们进行过专门考察与悉心探索,但是,像该论著这样如此从理念和对象上贯通中西古今,而且作出如此流畅而可靠的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历史爬梳与意义辨析的,在我则尚未有闻。它从繁复多绪的中国古典小说堆拥丛聚、乱花迷径的文本呈现中,明晰地离析出两个传统与各所侧重的两个主导修辞模式(“言语”与“书志”),对它们的差异与互动,对其在历史发展流程中必然发生的自身调整与嬗变,均做出了颇具新意的动态性的解析。比较而言,因其重点考察的是自宋元话本而后的小说修辞模式的发展,所以对“言语”这一修辞模式的嬗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论析亦更为精到。为我所叹服者,还尤其在于论者对宋元话本以来小说修辞模式历史发展的转折樁接处独具会心的发现与精彩阐释,如对“四大奇书”和《红楼梦》已开始出现动摇“说话人虚拟修辞”因素的揭示,对小说修辞近代转型时“谴责小说”中“说话人”的个性化、抒情化特征的指陈,对原本作为小说文本外部构成的诗词在五四时期小说中的内化问题的阐释,读来都令人击案!书中精彩之处难以一一具言,好在大家阅读后会自有判断。

读这部书稿时我也在想,要完成这样的一部论著,没有跨学科的知识积累和相应的理论修养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而据我所知,郭洪雷博士主攻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但多年来一向又特别喜爱研读中外理论著作,而且硕士阶段还专门选择了古代文学专业,所以,有此基础,他做成了这样一部书,也就不难理解,应该说,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

当然,也并不能就此说,这部论著在中国小说修辞模式嬗变方面的研究已经做得十全十美。比如说对宋元以来体现为“史传”传统的“书志”模式,就相对而言言之过简,而相应的,在谈论五四时期小说修辞时,对“写实”一脉的解析较之抒情小说也略显逊色。这也许可以说是一点美中不足吧。

2007.12.13



引 言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虽然没有统计，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段文字是梁启超文章中被引用最多的段落之一。如从词频看，重复率最高的是“新”，梁启超强调的是“新”，引用者看重的也是这个“新”字。然而，小说之所以能“新”，能够“使之新”，着力点终究还在“支配”二字。以往研究中，人们引用这段文字，看到了在铺排夸张的修辞激情中，梁启超对小说社会功能的奢望和想象；看到了学界领袖“登高一挥”给小说变革带来的深远影响；看到了将民族、政治、宗教、道德、风俗、文艺、人心、人格的变革交托给小说这一行为，显示出的执拗，或者说幼稚；甚至看到了梁启超身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气息。在梁启超修辞激情感染下，研究者却轻轻放过了“支配”二字，也就无意间错过了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修辞^①之纬。

① 这里的修辞是指“作为修辞的小说”亦称“宏观修辞”或“广义修辞”，它不同于“小说之中的修辞”，即“微观修辞”或“狭义修辞”，后者是指小说中公开的可辨认的手法或辞格。而小说的广义修辞被视为作者与读者之间完整的交流活动。参见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付礼军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8页。



梁启超真正看重的还是小说“支配人道”的力量。他在文章中写道：

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二曰浸。熏以空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广狭；浸以时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长短。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义也。熏浸之力利用渐，刺之力利用顿；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觉，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刺也者，能使人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①

对于梁启超的“四力说”，研究者褒贬不一，众说纷纭。^② 出现这种情况实属正常，梁启超以转义方式，借用佛学话语论说小说“支配人道”的功能，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开放的阐释空间。但是，在以往的众多解释中，研究者始终没有注意到佛学话语本身的文化属性，这种文化属性与小说社会功能之间的共通性，使得梁启超的转义论说成为可能。此种“共通性”就是佛家宣教与小说“支配人道”所共同具有的修辞性。虽有研究者对此有所触及，认为“四力说”，并不专指艺术感染

① 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1902年11月14日。

② 参见谢飘云、张松才：《近百年来“小说界革命”研究述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力,而是一种精神感化力,即精神、道德、伦理的教化。^①但可惜的是,也许是出于对“教化”的反感,这点可贵的认识,随即被否定掉了。由于缺乏必要的话语意识,在过去的研究中,“四力说”中所隐括的对小说修辞性的认识,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析取。

当然,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对文学与小说所具有的修辞性的认识不乏其人。1915年,恽铁樵曾在《小说月报》发表文章,论说“言情小说撰不如译”,他从五个方面加以论述,其中最后一点认为,“吾国撰者”没有系统的修辞学训练,在小说的“结构意趣”上,相较于“彼邦文士”,未必能“驾而上之”。文中写道:

修辞学之原则有三:曰理、曰力、曰美。头头是道,有条不紊,是之谓理,……深入显出,神气跳动,是之谓力,……色、香、味俱足,是之谓美。理为第一步,力为第二步,美为第三步。有其一无其二与三,不过程度问题:舍其一用其二与三,则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此故非言小说,然小说不能离文学独立,宁得背修辞之公例?^②

从恽铁樵文章对小说中修辞的论述看,虽个别方面稍显粗糙,但整体的领会还是比较准确的。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他已对小说中的微观修辞和宏观修辞,进行了自觉的区分,认识到“今以词藻自炫,是背修辞公例,安在能补助哉?”^③此种自觉的修辞意识,当时颇为难得。

再如周作人,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对“中国文学的变迁”有过一个简要的概括,认为文学最先混在宗教之内,后来由于性质不同分化了出来。分出之后,在文学的领域内马上又有了两种不同的

① 王齐洲:《重评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荆州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

② 铁樵:《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小说月报》第6卷第7号第2页,1915年7月25日。

③ 同上文。



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的嬗变

潮流：“言志派”和“载道派”。周作人认为：

中国的文学并没有一定的目标和方向，有如一条河，只要遇到阻力，其水流的方向就起变化再遇到即再变。所以，如有人以为诗言志太无聊，则文学即转入“载道”的路，如再有人以为“载道”太无聊，则即再转入“言志”的路。^①

就话语性质而言，周作人对中国文学史的描述也是转义性的。文中周作人重提文学与宗教的“姻亲”关系，是否暗示着文学“体内”始终葆有宣教式的修辞性“基因”，我们可以存而不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所强调的“言志”与“载道”，在本质上都带有宏观修辞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周作人正是从两种不同的修辞方式入手，来描述他心目中的中国文学史的。^②

梁启超将小说修辞的作用方式称为“支配”，周作人将中国文学修辞的主导方式归结为“言志”和“载道”，亚里士多德则将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③表面看来，三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将它们放置在一起，贴上“修辞”的标签，也会给人牵强之感。甚至这样的方法，也为当下的研究所忌讳。但是，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修辞传统，这一传统在《周易》时代就已开启，“修辞立其诚”^④所体现的伦理精神，不仅成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了中国人修辞行为的基本规约。在这一传统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西方修辞理论，发掘、清理中国小说自己的

①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② 参见郭洪雷：《文学史中的“文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③ 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颜一、崔延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罗念生将这段文字翻译为：“一种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参见罗念生译《修辞学》，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4页。

④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8页。原文：“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修辞传统,寻找在小说传统中湮没已久的修辞智慧,重描中国小说修辞模式嬗变的轨辙,为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研究标示出一块新的经验空间。实际上,在以往小说研究中,这样的理论借鉴有过成功的经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采用西方小说修辞理论的近亲——叙事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小说,一度成为小说研究中的显学,赢得了众多研究者的青睐。叙事学方法的使用,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小说研究的空间。从这个角度说,对修辞学方法的借鉴同样值得期待。



目 录

序	孔范今	1
引 言		1
第一章 小说修辞:一个有待标示的经验空间		1
第一节 小说研究:从叙事学到修辞学		2
第二节 小说研究中的宏观修辞与微观修辞		17
第三节 本研究的理论构成及思路展开		20
第二章 中国古代小说的两个传统与两个主导修辞模式		33
第一节 在唐传奇的“背后”		34
第二节 中国古典小说修辞的“言语”模式与“书志”模式		40
第三节 宋、元话本:“言语”修辞模式的成型		49
第四节 “说话人虚拟修辞”惯性下的明、清章回小说 ——以“四大奇书”和《红楼梦》为中心		67
第三章 中国近代小说修辞的多向突破		77
第一节 近代小说文本构成发展的三个方向		77
第二节 一个不能忘记的人和他组织的一次活动		96
第三节 “蝉蜕”之迹:“四大谴责小说”的文本构成		101
第四节 小说修辞模式现代转型中的苏曼殊		124



第四章 现代小说修辞模式的建立(上)

——兼论五四小说的诗性修辞	141
第一节 “浪漫主义”:古今与中外	142
第二节 五四小说的“浪漫”倾向及诗性修辞的限度	149
第三节 “写”与“做”: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现代小说修辞意识的自觉	162
第四节 短篇小说的兴起与现代小说的时空意识	174
第五节 个案分析:张爱玲小说的色彩修辞	192

第五章 现代小说修辞模式的建立(下)

第一节 艰难的“命名”:从“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 ——五四“写实”小说的修辞困境	204
第二节 “推倒”与“建设” ——“现实主义”修辞成规的初步建立	213
第三节 “说话人”的“幽灵”——代结束语	232

附录:新、旧修辞学对小说修辞研究的启示

一、古典修辞学及其社会、文化品格	244
二、新修辞学的理论走向	251
三、布斯小说修辞理论的贡献及其局限	261
四、新旧修辞理论为小说修辞研究提供的理论可能	269
五、小说修辞伦理与叙事伦理	277

参考文献

后记